

去年9月19日,我在承办了纪念顾准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以后,开始考虑今年9月召开纪念《国富论》出版24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南开大学的王玉茹教授获悉我的打算后,极力赞成,热情鼓励,她说亚当·斯密工作过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正好与南开大学有校际合作关系,2016年将在天津举行经济学史方面的学术会议,届时可以邀请该校的学者到上海来参加我们的会。同时,她还介绍说,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是国内翻译研究《国富论》的权威,已经107岁了,还在从事学术研究,建议我们从杨教授向会议写一封贺信,她乐意从中牵线。

此后的会议筹备,一直得到各方面的鼎力襄助。院、所领导的支持自不待说,充满活力的学科团队成员更是群策群力,全力以赴。那边王玉茹教授

不仅为我们请来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几位教授,还告知杨敬年教授非常关心这次会议,特地让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专家来沪参会,还专门向我们的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这篇文稿思

## 学者

钟祥材

路清晰,逻辑严密,显示出大道至简的学术境界。然而在我们的会议即将举行的前一周(9月4日),传来了杨敬年教授逝世的消息,实在令人震惊和悲痛。因为就在9月2日,王玉茹教授还给我发邮件说,看了你们发来的第三轮会议通知,上面有“会议向发表演讲和宣读论文的学者支付稿酬”,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是否合适?杨敬年先生108岁高龄,对这个会议非常重视,不能亲自到会,但是非常认真地

车至神户已是掌灯时分,我们下榻的波多比亚酒店位于一座人工岛上,濒临港口,三面环海。也许夜幕笼罩,从阳台上望出去没看见海,只是一片璀璨的灯光,楼底下一泳池水泛着湛蓝的光,远处一列灯火通明的火车正缓缓开过。想着前一晚还在箱根泡温泉,外面是漫天的海风,真是两重天啊。神户是这趟日本之行

的最后一站。安排停当,趁着还早,我和妻子想到市区逛逛。但酒店离市区尚有一段距离,在附近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路,回到酒店门口正巧碰到同团的一对老夫也。在询问服务生,他听我们是中国人,马上喊来一位短发姑娘。这位看上去文静的小姑娘原来是福建人,在日本已工作多年。她一边笑着介绍怎么去市区,一边询问我们游了哪些地方,并主动

## 神户的夜

陈德平

那天晚上,不停有陌生人加我微信,我很奇怪,就问其中一个是谁,他们说是kimi的粉丝,kimi是乔任梁。去年,乔任梁在朋友圈转发了我孩子生病急需帮助的消息。去年孩子因为手足口病引发血小板减少症,入院五天,血小板几乎为零,而血小板又属于非常稀缺的血液制品,需要当场献血以后现场采集。脆弱的生命危在旦夕,我到处求助,当然不忘“万能的朋友圈”。

## 温暖

杨璐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是怎么转发到乔任梁的朋友圈中,他不仅转发了,还作了热心的评论和发动,后来更是持续关注。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是个落伍的人,对于现在的明星几乎一无所知。也是在前几天乔任梁去世的新闻中,我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大男孩,却怎么想不到他还曾经热心地帮助过我。

那一次孩子的生命接力赛,太多太多好心人给予了我们一生难以回馈的爱。我的小学同学成立了“韩嘉睿加油小组”,从物质、经济和精神上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保障。儿科医院给予我孩子的精心照顾,让白衣天使们成了孩子念念不忘的人。我的邻居们和孩子同学的家长们,负责做饭与接送,那些起早贪黑的日子,印刻下他们的拳拳热盼;那可口的饭菜,尽管孩子吃不下,却是我们身为父母勇敢挑战命运的第一道保证:我们从难中吃不下任何东西,到半夜里大口喝鸡汤,吃排骨——我们自己也不垮,才能帮助孩子战胜病魔。

我自己也曾经和单位同事一起帮助过一位身患眼部肿瘤的小朋友,他的爸爸居然放弃了在工地打工每天两百块的收入,从浙江赶来看望我们。我心烦意乱,婉拒他的探视。不想,他说因为孩子在这里看过血液科的专家,所以愿意替我去找这位医生。我霎时呆住了,我能想象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是怎样嗫嚅着和医生说出血来,也能想象医生该有多么惊讶。直到今天,我依然后悔自己内心曾经是多么多么与势利。

还有很多很多遥远却又贴近的温暖。我的手机里保留着华山医院一位不认识的教授的询问短信,还有好几个不相识却有相同经历的母亲的鼓励。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还有很多像乔任梁这样积极为我孩子寻求救助但是我却永远也想不到的人。我对他的粉丝们说,太温暖了,可是这温暖中带着伤感。你们的偶像走了,但是请你们更好地活着!我也给我刚过四岁生日的女儿写下一封信,我这样寄语她:希望你对于疾病的认识不只是冰冷的医学名词和沉重的账单数字,而是背后的人间大爱。希望你,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练就一双慧眼,不被世俗的狭隘裹挟,用心体验,你最终会发现,这世界,真爱多于虚假,美好多于丑陋。

为会议录制了录音,所以我想请你们为老先生发一份稿酬……

杨敬年教授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说,自己是在90岁高龄时开始翻译《国富论》的,每天伏案4小时,历时11个月,得80万言。为了缅怀这位经济学前辈对《国富论》翻译和研究的贡献,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不顾操办会议后的劳累,暂别养病中的老母,特地到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她深情回顾了杨敬年教授的传奇人生,高度赞扬了他的学术成就,令中外嘉宾肃然起敬。

记得南开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员单位之一,而西南联大的学风、学者和学生,在学术界是有口皆碑的。这种优异卓然的传统,分明仍在延续。

飞机上要不要关手机,过去用不着讨论,现在成了问题。过去很简单,都必须关,有人不关机,似乎有些严重,绝对对人神共愤。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出国,几乎不用的手机与箱子一起塞行李。

结果飞机落地,突然有电话打进来,大家都很震惊,都抬头看,空姐更是神情紧张。都在想这是谁的手机,我的朋友很尴尬,觉得自己为国家丢了脸。都说中国人在国外不检点,朋友很爱国,也很绅士,为了这事,一直内疚,虽然没罚款,甚至没被过多指责,仍然是一想到就脸红,一说起就连声惭愧。

中国人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说话,小孩在俄罗斯皇室的地板上尿尿,类似的负面新闻太多。我于是也怀着些小心心态,很想找找外国人的碴,譬如到了日本,不得不承认人家干净,见到地上有个空矿泉水瓶,仿佛逮着什么错一样,立刻指给身边人看。然而人家说瓶子

很可能是中国人扔的,于是无话可说,毕竟没看见谁扔,眼见为实,不能瞎说人家。

都说德国人古板,最守规矩,火车从不误点,没人闯红灯。我在那待过一个月,说起误点,恰巧遇过两次,一次晚几分钟,还有一次是取消班次。这大约很少发生,同

## 飞机上要不要关手机

叶兆言

行的德国人也难得遇到,直摇头。到了柏林,冒冒失失闯红灯的人很多,让人大开眼界。这一次没看走眼,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德国朋友不觉得难堪,解释说此地外国人多,过去又是东德范围,言下之意,在西德完全不一样。

有一次从法兰克福飞克罗地亚,旁边坐一位年轻美丽姑娘,一路上都在看飞机上的杂志,一本印刷得很漂亮很厚的书。快下飞机,让我感

到很意外,她居然偷偷看一眼空姐,把刊物揣进了自己拎包,幸好她拎包足够大。

最近几次出门,不止一次发现有人在飞机上不关手机。广播里提醒根本不起作用。中国大叔大妈胆子小,都还能遵守规则,通常是年轻人置若罔闻,尤其外国人不遵守的居多。空姐过来警示,人一走开一切照常。

最夸张的是去韩国,周围一群叽叽喳喳的姑娘,一路上都在玩手机。是我们东航的飞机,空姐一次次过来提醒,没有任何作用。空姐也不当真,见怪不怪,有时干脆当作没看见。韩国姑娘显然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不是第一次坐飞机,给我的印象就是,韩国很可能已没有关手机的规定。她们可能会想,你们中国还这么保守,还这么老套,飞机上玩玩手机根本没关系。

牙齿与人生的关系可谓密矣!当新生幼儿的牙床上刚刚露出一粒小白米时,做父母的无不欣喜若狂:宝宝长牙齿啦!又过了若干年,孩子上颌或下颌的切牙或尖牙松移、摇动了,家长们忙着给孩子拔牙,换牙可是人生长大的标志之一!到了老年,牙齿开始一个一个地掉落,于是,无数感慨就此涌上心头!在中国古代诗词中,关于“落齿”“缺齿”“少齿”“无齿”的描写,不计其数!

宋代高斯得曾云:“韩公四十五,已赋齿落诗”,刘克庄则曰:“退之落齿感慨”,王十朋也说:“齿落如退之”,可见,历史上写掉牙最有名的当推唐代韩愈在45岁时写的那首“齿落诗”。

“齿落诗”标题本为《赠刘师服》。刘师服是与韩愈同时代的一名进士,与韩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但刘师服的牙齿很好,韩因此借题发挥道:“羨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牙豁(空阔、敞开之意)落者多,所剩十余皆兀臃(动摇)”。他形容自己因牙齿不好,只能“匙抄烂饭迟送之,合口软嚼如牛呵”。家里人恐怕他因此而心情惆怅,饭桌上连栗子梨子等不易咀嚼的东西都不敢放置。想想今年才45岁啊,“只今年才四十五,后日悬知渐莽卤”,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此地明写的是牙齿掉落,其实是感叹命运不佳,前程渺茫!

作者接着写道:“忆昔太公仕初进,口含两齿无赢余。虞翻十三比且少,遂自愧恨形于书。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检点形骸外。巨擘东钓(韩愈)“一饱鲸鱼脍!”他举了姜太公、虞翻两个牙齿掉落得厉害仍旧为世所用的例子,表明了不以外形之丑陋与否取人用人的主张,自信今后仍然可以在政治上大有可为。“巨擘东钓”“一饱鲸鱼脍”两典故说明官场被贬是暂时的,将来必有重新入海翻江,大有作为之时!

除了这首古诗,韩愈前后还写了《送进士刘师服东归》《送刘师服》等篇,直抒胸臆道:“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仆本亦进士,颇尝究根源。由来骨硬梗,喜被软弱吞。”;“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从牙齿掉落说起,转弯抹角还是回到人生的不甘追求上来!那个大赞韩愈、引起共鸣的高斯得也是在50岁时掉了牙齿,“我今恰半齿,衰暮固其时。一齿阙当门,撼(沮丧)其秋叶飞”(《齿落》)。但他最后也把主题落脚到“圣路千万里,加鞭犹可迟”。从牙齿与人生的关系上看,两者的思路完全一脉相承!

## 牙齿与人生

顾云卿



意大利小路 (水彩画) 朱大白

聊起她曾去过的几个好玩的景点。他乡遇国人,真有种亲切感。我们和小夫妻照她的指引上了酒店二楼的轻轨站台,不想在站台遇见了我们此行的导游,20多岁的姑娘,一张胖胖的脸,说起话来像扫机枪,风风火火的样子。此时却有些尴尬,我知道她又去干代购的活了。这一路,每到一地安排好住宿,她就像离弦的箭悄悄出去购物,好几次在超市碰到她,大包小包拎得满满的,看她的微信全是代购广告。进了车厢,她上前说,我带你们去神户最热闹的地方,不过回来你们要带我呵。我明白她的意思,轻轨晚上9点半停了,回来就得坐出租车。坐下发现车内没开灯,只有外面的灯光照着里面的

人。乘夜车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上来下去默默无声,车内十分安静。在这样的氛围里,谁都如同感染一般,自觉成了文雅之士。

大约20分钟就到了市区。导游熟门熟路,径直带着我们下了站台,先去了一个集市,见已关门,就直奔闹市区。几条主街并不长,前后相拥煞是繁华,街上人来车往,店面一个接着一个,霓虹闪烁,流光溢彩,时有穿着很潮的青年从身旁走过。导游忽地钻进一家商店购她的物去,等了半天也不见出来。我们想看夜景,就急着给她打电话,她回话说,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待一会。我们便不再等她,自个儿逛起来了。都说神户牛肉有名,想品尝一下,可找了几家饭店都说



打烊了。一瞧时间已过10点,决定打道回府。可拦不到出租车,好不容易见一个路口刚停下一辆车,急忙上前报了酒店的名字,司机一脸和善,笑着示意让我们上车。灿烂的灯火渐渐远去,车驶入黑夜中,不一会儿就到了酒店。挥手与出租司机告别之际,蓦然有了对神户的一丝好感,尽管只是匆匆一瞥。

返回上海,在机场等待行李的时候,正好挨在导游旁边,她指着刚拿到的行李说,我容易吗?爸妈离婚了,我妈没有工作,靠我生活,我不兼职干点活能行吗?她像是自我解嘲,又像是在旅程结束前解答我的疑虑。一如往日的直爽,不过倒是第一次听她讲身世。我有些歉意,看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谁也活得不容易。

能够受到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的两次委约,我深感荣幸。第一次委约作品《白鬃豚歌》创作于2013年,是一首室内乐作品,用以纪念长江上已灭绝的白鬃豚。2014年,通过与内蒙古的安达组合合作,我又创作了一首交响协奏曲《最后的草原》。这两部作品成为我的音乐成长之旅中的里程碑,促使我走出舒适区,勇于尝试,深入探寻自己的文化根源、定位以及未来发展的领域。

我对东亚音乐、历史、传统和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颇感兴趣,给予极大创作热情。艺术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通过音乐将两个领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2013年扶青计划的主题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恰是激发我创作《白鬃豚歌》的灵感来源之一。扬子江畔的渔民通过美丽的民间传说,将白鬃豚的故事娓娓道来:

有位公主爱上将军,然而她的父亲却通过包办婚姻执意要她嫁给富商,公主走投无路之际,投江自尽,化作白鬃豚,从此为穿梭于风浪紧急的三峡水域的渔民保驾护航。但白鬃豚的灭绝,与长江流域生态和文化破坏

息息相关,让人深感痛惜。白鬃豚成为了历史,渔民世代相传的故事也随之消失,成为环境污染、过度开发的牺牲品。《白鬃豚歌》就是借用扬子江流域的音乐元素,通过竹笛在中心乐章里叙述,寄托我们对母亲河环保的担忧和关注。

《最后的草原》是我用音乐唤醒公众环保意识继续。在创作该作品之前,安达组

## 用音乐唤醒环保意识

吴承昊

合邀请我到内蒙古采风,我因此接触了内蒙古民族音乐,还有机会深入了解蒙古族生活方式和他们对于城市化和环保的看法。安达组合为了让我体会草原生态的脆弱,特意带我探访一个已半沙化的草原,让我感触良多。在我体验内蒙古民族生活的同时,也感觉到他们对传统家园的未来命运的担忧乃至些许的绝望。“安达”在蒙语中意指兄弟情怀,就像安达组合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音乐家

庭一样,我想通过我的音乐邀请大家加入保护大草原的大家庭。

通过音乐来表达社会及环保议题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上海国际艺术节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通过参与艺术节,我有幸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同时还吸引了媒体的报道和跟进,如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和中国中央电视台。2015年初,作为“扶青计划”的优秀曲目,《白鬃豚歌》有幸被艺术节选送到“亚洲协会”在纽约演出;该作品随后还在美国的麻省和加州演出;此外,该作品还将在今年10月在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成立60周年的庆典上演出。与此同时,我正在和安达组合讨论将《最后的草原》搬到美国演出。

当我回顾“扶青计划”,不仅有开心的经历,珍惜所学到的知识,更是满怀感激之情。我认为,唯有让委约作品继续在舞台上演出,让其影响更广,才是对上海艺术节最好的回报。

追看年轻人把内心的创作欲望激发出来。